

李国文 / 著

文人江湖

作家出版社



文人江湖

李国文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江湖 / 李国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5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319-7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0336号

文人江湖

作者：李国文

责任编辑：贺平 赵莹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86千

印 张：26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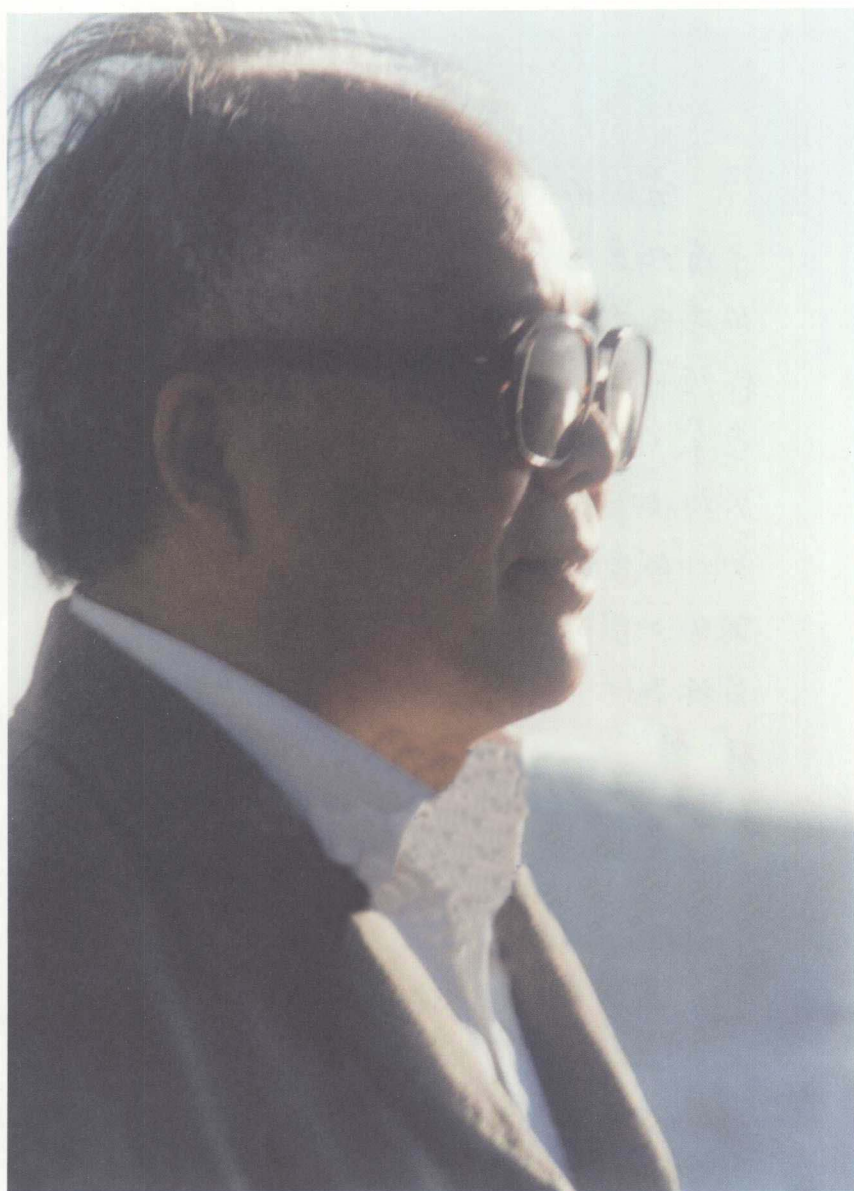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19-7

定 价：36.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國文

古代的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周有德以前的举荐制度，和德心心的科举制度，统治者除了查禁、荫补、恩赐、捐纳诸渠道外，大部份官员还是按照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从知识分子中选取的。因此，仕的来源为士，士的目标为仕。这两者基本上等于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而其价值中心，则是一个“权”字。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无一切，权比亲爹还亲，权比性命更重。

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

李国文 1930年出生于上海。

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曾经划过“右派”。1979年平反，以短篇小说《月食》和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奖，重新回到文坛。嗣后《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等长篇小说出版，《没意思的故事》、《涅槃》等中短篇小说集问世。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随笔散文创作领域，先后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李国文说宋》、《李国文楼外谈红》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等书。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目 录

屈原之死	1
李斯西行	13
耗子玩猫	24
南北西东	40
鲈莼之思	54
报国情怀	65
权力场中	75
生死关头	89
名士张岱	100
儒医傅山	113
嵇康和阮籍	126
李泌的聪明	137
白居易饮酒	148
风流陶学士	165
苏东坡戒诗	179
宋朝的才女	193
文人的浪漫	207



文人江湖

文人的殉节	216
回味张大复	226
两面董其昌	240
毛奇龄其人	251
完美王士禛	264
愉悦袁随园	276
孤直梁鼎芬	294
磊张叶德辉	305
王世贞的感觉	316
钱谦益的歧路	328
慈禧躺着中枪	340
孔夫子陈州绝粮	352
登高一呼韩昌黎	362
撒马尔罕的金桃	373
苏东坡与王安石	385
时人谁识李二曲	398

屈原之死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中国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暗，然而，值得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雾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死了，还活着。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皇帝，总是要去他妈的，但是屈原，中国人都记得住。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闾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

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也就无所谓郁闷了。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做到类似美国国务卿那样重要的职务，能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所以，为左徒时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荆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了，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降职遭遇，比降职更糟的是冷落。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门可罗雀。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而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写顺口溜、写大白话、写标语口号的“伪”诗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云泥之分的冷热、天渊之别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抒发满腔悲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对于碧落黄泉式的命运安排，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个“怨”字，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

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当朝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可能有小，小如苏洵，死后授霸安县的主簿职，正科级干部。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时，也注定了中国文人必须依附国家机器，必须仰仗统治阶级，必须听命于上级、上司、上峰、上面的意志、命令、训示、指导。必须按照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的空间中、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自然很不爽，可你别忘了老百姓有句谚语：“端谁的碗，服谁管”，“吃谁的饭，为谁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伙计听老板的，没有老板听伙计的。

对统治者而言，你是文人，不错，但你更是陛下的臣仆。作为文人，也许你是自由的，作为臣仆，你就没有资格跟陛下谈自由了。这也是中国皇帝不停收拾文人的原因，就在于你得到文人的自由时，常常忘却你作为臣仆的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考究，在朝就不如在野，那些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公家口粮、自食其力的在野文人，要比在朝文人拥有相对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在野文人，过去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还是少而又少。因为，文人要靠稿费生活，别说老婆养不起，连填饱自己肚皮，都难。因此，历朝历代，在野的削尖脑袋想成为在朝的，在朝的时刻担心在野的挤掉他；在野的为了吃公粮关官饷列入编制内必须干掉在朝的，

在朝的为保住自己饭碗必须提防在野的将他搞倒，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潜规则。况且，谁在野，谁在朝，都非终身制，而是在不停演变之中。今天在野，招安了，委任了，体制内了，黄马褂穿上了，明天就算是在朝之官。同样，今天在朝，流放了，开革了，体制外了，扫地出门遣返回乡了，明天成为在野之民，也是常见的事。

因此，中国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一个文人从陛下那儿得到这个任字，还愁没有权力可用，没有轿车可坐，没有银子可拿，没有待遇可享吗？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不得烟儿抽，看上面白眼，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罗江了。

楚怀王半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作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罔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谏论；只听顺心的话，不听逆耳之言。而这个熊槐犯起病来，绝对是老百姓所讽刺的，“拿着屎橛当麻花”、“死爹哭妈”的主。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踟躅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

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嫫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螭螭蛄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个屁。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但是，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干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这是傻子也能算得出来的题。“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终于让这个昏君学会傻子也会做的算术题。熊槐开窍了，好吧，你就放手干吧！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连蒙带唬，连骗带诈，加之许愿、收买、塞红包、给好处费等等，聚会于楚国京城郢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忙得诗人差点吐血。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歃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为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

识一些朋友，自从仕途上一路顺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基本完蛋。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正如一个子宫萎缩、停止排卵的女人，还要她怀孕生育，那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吗？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作为博导的他，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时候，文学就会短板。相反，在文学上成功的时候，政治就会失聪，这是中国文人很难两全的弊端，也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读到的案例，文学大成功，政治大失败，因而丢了脑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激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他，一比三，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专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最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不聋不瞎，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诗人的最大疏忽，是毫不介意那个昏君耳朵根子软的选择性耳聋，认为步楚庄王后尘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感激他都来不及，岂有马上变脸翻牌的可能？诗人啊诗人，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对于

王八蛋，对于那些具有王八蛋倾向的人，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尤其不能因为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王八蛋了，就认为从此往后，他永远不王八蛋，那才真是百分百的痴人说梦，这恐怕是诗人最为失算的地方。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连屁用都不顶的感慨。

诗人宣泄感情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他们告你的状，为什么你就不能告他们的状呢？他们无中生有地陷害你，为什么你不以牙还牙地中伤他们呢？他们不君子，你何必君子？再说了，铁三角真的就那么铁吗？为什么你不下点工夫，分而治之，拉住一个，稳住一个，集中火力打击第三个呢？对这班明码标价的小人，你姑且小人一回又何妨？

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里，除此之外，更有阴谋暗算、挑拨离间、欺骗诱惑、阿谀奉承等统称之为卑鄙的行径。他卑鄙，你不卑鄙，你就被他干掉；他卑鄙，你也卑鄙，双方打成平手；他卑鄙，你更卑鄙，你就占了上风。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纡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污纳垢，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

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世混浊莫事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你等着完蛋吧，屈老先生！

屈原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于所碰上的皇帝，其智商并不比白痴、低能儿高明多少，才造成民不聊生的灾难，才出现暗无天日的岁月。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一对混账，多费文墨，故而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嬃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乃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

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俎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走向延安重庆，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在北平的周作人，粉墨登场，变节卖身；虽然，在孤岛的张爱玲，勾搭汉奸，为虎作伥。虽然，时下一班嗜痂癖者，出于反共情结，屁颠屁颠抬轿，想方设法吹捧，但是，请记住，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

果然，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郢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怀王十五年（前304），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笨蛋，而这样的笨蛋居然坐在一国之主的位子上，老百姓只能欲哭无泪。第一，你拿到了这六百里地，再与齐毁约背盟也来得及的呀！第二，如果张仪坚持齐楚联盟不解散，六百里地不给，那你完全可以不见兔子不撒鹰，反正秦是有求于楚呀！第三，即使上当了，秦国的土地没有得到，你也没损失什么，齐国的友谊泡了汤，还可以重修旧好，你一个二流强国，单打独挑，逞匹夫之勇，与一流强国较量，岂不是找挨打吗？